

广西僮族自治区
东兰县中和人民公社
东里屯社会历史調查报告
附录：革命故乡东里屯

内部資料
注意保存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說 明

《广西僮族自治区东兰县中和人民公社东里屯社会历史調查报告》和《革命故乡东里屯》两篇材料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由我組曲軍鋒、汪明瑀、郭汉材等同志在該地进行調查所获材料的基础上，我組部份同志先后参加整理編成的草稿。为了积累資料，今年十一月由黃昭同志加以修改編印出来以供有关方面作內部参考之用，但因水平有限，時間也很仓促，有些材料沒有来得及核对，錯誤之处，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壹、一般情况	(1)
貳、东里屯农业在飞跃中	(2)
叁、政治面貌	(10)
一、解放前的政治斗争情况	(10)
二、解放后各大运动的发展情况	(11)
三、东里党小组(略)	(16)
四、民族关系及其民族干部的成长	(16)
肆、三十年来的宿愿——人民公社	(17)
伍、发展中的文教卫生	(19)
附表: (1) 东里屯户口人数统计表	(23)
(2) 东里屯民族分布统计表	(23)
(3) 1959年东里屯阶级成份统计表	(23)
附录: 革命故乡东里屯	
革命故乡东里屯	(27)
一、打倒土豪	(28)
清算杜八	(28)
活捉韦龙甫	(29)
二、星火燎原	(31)
三、血仇	(34)
四、光辉的一页	(36)
五、曙光在前	(39)
六、大闹翻身	(40)

七、步步登高	(46)
八、喜庆丰收	(53)
水坝歌声.....	(55)
乘风破浪.....	(58)
九、鋼花鉄水	(63)
十、文化紅旗	(66)
紅領巾.....	(66)
老罗学懂文.....	(67)
送走瘟神.....	(69)
十一、亲如一家	(71)
十二、前途似錦	(73)

壹、一般情况

东兰县中和人民公社那烈大队所辖东里屯是一个比较大的自然村，它包括着廷岭、那劳、未旺、扳别和扳拉等五个小自然屯。共七个生产小队，一般也称做东里片或第三片，它是广西右江革命老根据地，也是韦拔群烈士的故乡。

这个片杂居着以僮族为主的僮、汉、瑶等三个民族，全屯共有127户，681人，男307人，女374人，其中僮族有90户，465人，瑶族11户，63人，汉族26户，123人。（附表一）

廷岭屯是汉族聚居共12户，54人，男23人，女31人。那劳屯是僮族聚居共7户，33人，男15人，女18人。未旺屯是僮、瑶杂居共30户，140人，僮族27户，124人，男58人，女66人，瑶族3户，16人，男5人，女11人。扳别和扳拉两屯都是僮、瑶、汉三种民族杂居，扳别屯共35户，210人。僮族19户，130人，男61人，女69人。瑶族6户，36人，男19人，女17人。汉族12户，44人，男18人，女26人。扳拉屯共45户，244人，僮族39户，208人，男85人，女123人。瑶族2户，11人，男4人，女7人。汉族4户，25人，男16人，女9人。（附表二）在这里的住户中以黄、陈、韦为大姓，其他各姓如：覃、牙、陆为少，也只有一个、二家。

它是在那烈大队所在地（那烈乡）的北面，与大队相近的有扳别、未旺和扳拉。约三、四华里，最远的有那劳和廷岭也不超过10华里。

这里的景色秀丽，周围山峦连绵。同时，也有着一块块丛林平壩和一条东平小河。气候温和，最高为华氏84°—92°，最低为华氏32°—38°。一般从3月到8月是穿单衣，9月到11月是秋天，多穿袂衣，全冬仅12月到翌年2月为最冷：只穿棉衣就可以过冬，这里的冬天不下雪只下霜。雨季多在6、7、8三个月。每年元月多西北风，3至8月多东南风，9至11月多西南风，全年的东南风为最多，且最大，北风次之。

东里屯的交通路线，目前全屯山路：一条东通中和人民公社约10华里；一条南达那烈大队约4华里；一条西至西山弄烈大队约20华里；一条北到林隘大队约10华里，从东兰县城到中和公社，东中公路不久将要延长到这里。这里就可以直达东兰县城了，这里还有一条东平河，从西向东流，直通江平大队境内，惟河面狭窄，河底很浅，不能通航。

这里的耕地面积544亩，其中水田408亩，畲地136亩。另外还有274亩开荒地种植桐果、茶果和红薯没有包括在内，这个地方的主要农作物以稻谷、玉米、红薯为主，土特产除烟叶外，还有黄糖。每隔十天有一次圩场，圩场是在中和人民公社。商品大都是日用品和本地土产。商业设有中和商店，附近的农民都在那里购买所需的商品。1955年起在这里发现有蕴藏着大量的无烟煤，铁矿，英雄的东里屯曾掀起大办钢铁的高潮。

貳、东里屯农业在飞跃中

东里屯——多么使人向往和景仰的地方！

它是广西右江革命斗争的老根据地；它也是党的优秀儿子韦拔群烈士的故乡。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广西的革命势力也同全国各地一样地受到了反革命的残酷摧残，特别是这右江革命摇篮的东兰县东里屯，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在白色恐怖的情形下，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右江革命由高潮暂时转入低潮，右江党委也受到严重的破坏，绝大部分同志如韦拔群，陈洪涛也都光荣牺牲了，许多无辜的群众遭受到屠杀，群众的住房统统被烧光了，衣物锅头全抢空了，这还不算，全屯的人还整个被迫迁住到外乡，不准回来种庄稼。

1932年以后，流落在外的群众陆续回家了。但是，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田园荒蕪了，房屋灰灭了，疮痍满目，一片荒凉。在这样极端穷困的景况下，群众又忍饥挨饿，胼手胝足重新建立家乡。但，国民党反动派的毒辣压榨政策和当地地主豪绅的严重剥削，使破产了的东里屯农业，始终没有得到恢复。

三十多年来，这里的农民，就在这样悲惨痛苦的日子里过活着。可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始终继续不断的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1949年底，获得了解放。

象这样一个一年要缺半年粮，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使党在领导这里的劳动农民进行生产发展工作上，就显得格外艰难。因此，党从一开始解放这个地方起，就在建立和巩固农村政权的同时，便特别注意了这里的农业生产的发展。

如今十个年头了，党在东里屯领导农业生产方面，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并相应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它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变化是这样的：

高歌猛进中的农业生产

(一)

东里屯在现在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村了，翠岗环抱，风景怡人，杂居着僮、瑶、汉三个民族，在数量上是僮族占绝大多数，全屯包括着扳拉、扳别、未旺、廷岭、那劳五个小自然屯，共有127户，681人。它的耕地面积544亩，其中水田408亩，畲地136亩（不包括种植红薯桐果茶果等474亩地在内），主要物产有稻谷、玉米、三角麦、红薯等。（附表一、二）

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这里的耕地面积只有402亩；水田334亩，分甲、乙、丙、丁四等；1/3分布在靠近小溪的平壤，土地肥沃；2/3分布在山坡，地质较差；畲地68亩多分布在山岗、山脚、山腰坡岭地带。算起来，仅仅几年中，这里的水田已由原来334亩，扩大为1959年的408亩，增加了74亩；畲地由原来68亩，扩大为1959年的136亩，增加了68亩，此外还开荒畲地种植桐果等474亩。过去的好田好地多为地主占有，就连荒山野岭也都被地主占有。那时，东里屯全部耕地中；地主4户，占总人口5.32%，就占有耕地165.63亩，计为总耕地的41.20%，平均每户占有耕地41.4亩，为贫雇农的40倍；富农1户，占总人口1.1%，占有耕地的14.02亩，计为总耕地的3.48%，为贫雇农的3倍多。地主、富农合并计算，占

有全屯耕地的44.68%；中农11戶，占总人口10.1%，占有耕地的20.48%，平均每戶占有耕地7.47亩；而貧雇农97戶，占总人口83.48%，只占有全屯耕地的34.86%，每戶平均只有1.44亩。（附表三、四、五）

象这样多数人只有很少，而又貧瘠的土地，少数人却占有既多且好的耕地。这就是旧中国封建压迫的基本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问题的两个癥結之一的土地問題。

建立在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剝削形式，主要有地租、高利貸和僱工。地租的剝削在这里有实物地租。地主階級并不把全部或大部分耕地出租給农民，他們却少量的分散出租，或用低廉的工錢僱用长工或短工来剝削劳动人民。这样比地租的剝削还更残酷。

土地問題在这一种經濟結構的局限下，农民一直在遭受着极其苛刻的剝削，也忍受着极其悲慘穷困的生活。

东里屯当时的实物地租率，一般的要交給地主五分之三，好田、好地要交給地主三分之二，如甲等田，亩产450斤；地主得300斤，佃农得150斤；丙等田亩产300斤；地主得180斤，佃农得120斤；甲等地亩产350斤；地主得210斤，佃农得140斤；丙等地亩产200斤；地主得134斤，佃农得76斤。地租不但剝削了农民的剩余劳动，而且还剝削了必要的劳动，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这个基础上，农民剩余劳动率小，地主的剝削率大，生活費用的支出比生产資料的数量大，并不是农民生活过得好，而是一种半饥半飽的生活水平。这里的农民仅凭着这样的情况，实行耕作，自然条件又貧弱，剩余劳动便也很小了。这也就說明生产力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就說明东里屯几十年来的农业生产沒有很大发展的癥結所在。

僱工剝削在这里是苛刻的，因为东里屯的地主階級不是和县城里的官僚、軍閥勾結一起，就是国民党的伪乡长或恶棍，象地主黃世鵬就是一个伪村长，他凭借着反动政权，征用农民为他种田，还有象地主陈有祥等虽然不是凭借反动政治权力，但他們却凭借着占有的土地与生产資料，垄断了农民的生計，从經濟上迫使农民从事无偿劳役，貧农黃应伍、黃应陆等曾替地主打过工。这里的地主不給长工任何报酬，只給他一点瘦田讓他去种，或在年节給一些猪肉，这就是一年的劳动代价；短工也是不給錢的，帮一天得吃两頓飯就算了。秋收时，打短工的或得一两耬米。（一耬等于一升，相当老秤12两。）

高利貸剝削的普遍形式有借谷、借錢、借猪花等。利錢一般是一本一利。解放前，东里屯經常有60戶人家要借貸1,000斤猪肉。借錢、借谷都要折合谷价或猪肉价还。在旧社会高利貸的盘剝最是厉害。1947年貧农牙桂珍向地主黃世鵬借了相当于20斤猪肉的錢。到1948年，本利为40斤，牙桂珍只能还10斤，余欠30斤，到了1949年本利就变成60斤。两年之間利錢就增加两倍。还有放猪花，这也是地主不劳而获的一项剝削。1945年，貧农黃应今向地主黃世鵬老婆借一头母猪仔，养成母猪后，生下小猪，每一胎都要送給地主小猪两头，还要白替他养活两个月。到了1947年地主要回母猪且格外得到四个小猪。

解放后的东里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这里的农民首先从地主階級手里夺回了政权，从黑暗的政治統治下解放出来，并在人民政府合理負担的政策下，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稅和政治上的压榨，随着迅速展开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实行土地改革。旧日的农村面貌在1953年已經大大地改变了；反动的封建势力已打垮，原来少地或沒有地的貧雇农都已分得了土地，根本改变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和使用的情況；也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单从土改前后各階层耕地面积做一个比較，就看出他們截然的不同。这时候，貧、雇农的耕地面积已从土改前1952年的140.2亩耕地，扩大到1953年的336.69亩，而地主階級却从土改前1952年的165.63亩，减少到1953年的44.35亩。这是农村中的一

个巨大变革；这是共产党领导下贫雇农的大翻身。

(二)

在这样经济基础薄弱和生产力低下的基础上，党就根据这个村子的特点，进行了生产改革工作。

首先，党注意到充分利用土地和扩大复种面积。号召群众积极开荒。从1951年开始开荒83亩，扩大到1952年380亩（种植桐果茶果红薯，不种玉米）东里屯的全部荒地，除掉留下一些喂耕牛用的草地外，几乎统统开完了。在开荒了的土地上，种植了桐果和茶果，到1956年桐果和茶果都已结了实，全部归社员处理仅桐果一项，就卖出23,620斤。

东里屯的农民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生产，改变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从1954年开始组织互助组，1955年扩大到三个初级社的基础上，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合并成立一个那烈乡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果然，等级社一成立便显示了它的无比优越性。

解放前，这里的水灾和旱灾都相当严重。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一向不关心生产和水利的建设，加上这里的地势高低不等，山坡岭顶，同时地质多是石灰石，不容易积蓄水。1940年，梯田多已干旱，大都不能插秧，这一年秋收只得60%的庄稼，山腰、岭地也歉收了。旱灾严重，水灾也不例外，1944年夏收之后，雨水特多。绿油油的稻田刹时间就变成一片白茫茫的汪洋，在这“易涨、易退山溪水”的自由泛滥下。仅未旺一个小屯就有稻田22亩，玉米20亩歉收。

在党的领导下，群众认清了穷富不是生就的，高山洪水不是不能克服的。1956年旧历腊月25日群众组织起来了开始动工兴建“拔群水库”，到1957年六月间，河水涨大不能继续施工，群众的信心坚强，并没有向困难低头，1958年二月，工程浩大的“拔群水库”终于建成了。在修建水库的时候，充分表现了民族大协作，每天都从外乡调动各族人民有一千多人到工地上做工。

“拔群水库”共建筑了三道水坝；第一道水坝有16米长，库内面积有30亩宽；第二道水坝有22米长，面积有5亩；第三道有9米长，一亩宽，还修筑了两道渡桥，挖了两条渠道，从东里屯一直到巴学乡，全长约有八公里，灌溉了那烈和巴学两乡的田地共2千2百亩。东里屯原来得不到灌溉的约有80亩。占全屯水田的19.60%。现在也得到灌溉了。过去的干旱、水涝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田地种植率也随着增长起来了。这就更加坚定了社员战胜农业生产落后现象的信心和决心，掀起农业生产跃进的高潮。

过去这里除种植一季稻谷和玉米外，虽然也种植小麦、红薯，但数量很少。1956年，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种植双季稻和双季玉米。全屯种植双季稻的耕地为早稻120亩，平均亩产600斤；种植晚玉米的耕地为15亩，平均亩产650斤。

解放前，这里的耕作技术，一般两犁三耙，1956年，合作化以后，改进为三犁四耙，采取深耕细作，中株密植，大力施肥，每亩平均放肥100担以上；瘦田120担；乙等田100担，甲等田70担。

为了提高生产，党号召推广选用良种。过去农民在选种上存在着严重的保守思想，经过政府进行了宣传教育，从此群众才开始逐渐重视了选种工作。这里的玉米种籽是从靖西选来的。起初，群众怀疑不敢种，怕不合适，经过试验，结果，收获的产量多，平均每亩产量650斤。在种植期间，每亩施肥三次：第一次为50担；第二次为30担；第三次为30担。1957

年又将試种的15亩玉米，扩大为50亩，平均亩产为400斤。这一年，延岭屯开始种植中玉米25.8亩，平均每亩收407斤，其中7.8亩丰产地，平均亩产1,183斤，其中丰产的一亩，亩产折收干玉米为1,123斤，是当年中和区的一面高产红旗。它的丰收主要經驗是：（一）杂草三光 冬耕春犁——延岭屯的生产队长在1956年旧历十月收完紅薯后，就将田边杂草、玉米秆剗光堆积，过15—20天后，用火焚烧成草木灰。这样，既可以消灭藏在杂草中的害虫，又能积得一堆肥料。丰产地由于杂草三光，1957年中玉米受虫害特少；三光以后，继以深耕。过去延岭屯，多以小土犁翻地，犁得很浅，一般只3—4寸，所以玉米长得很差。1956年冬，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大胆創造了7把大鐮犁。当年11月中旬，就进行犁冬，深耕五至七寸；1957年元月犁第二次，多加深2寸；二月上旬犁第三次，再加深3寸。1957年，大部分畜地，深犁1.0尺到1.2尺。1956年高额丰产的那一亩，因仅犁深6—8寸，亩产平均只800斤左右，这說明了深犁是确定丰产的主要关键；（二）多施基肥适当密植——深耕必須結合多施肥料，才能达到丰产时节。延岭屯的玉米地是30度左右的坡地，必須多施肥料。高产的一亩，1957年共施基肥，干粪6,000斤；水粪6,000斤，追肥三次共水粪21,600斤，因而每亩产量2,246斤。在这6.8亩丰产地內，有1/3亩因施肥少，每亩平均只收1,027斤，少收1,219斤，其余由于施肥又較丰产地少，所以亩产只达600—700斤。

深耕多肥是密植的基础，密植又是丰产的关键。延岭屯过去采用老一套办法，每亩玉米仅种2,000株左右，产量較低。1957年，中玉米采用双行单、双株混合种植，大行1.8—2.2尺，小行1.2尺，株距0.8—1尺，每亩約种4,000株，由于深耕多肥，玉米扎根深，养分足，其中还有不少双苞植株亩产量較多；（三）深沟播种 保証全苗——播种的办法是先将土壤把耙至疏松細碎，用牛开行，深6—7寸，先将粪放入穴底，每穴約1.5斤，再淋水粪1.5斤，輕拨少量泥土于粪上，隔种而后下播，每穴下种2—3粒。播种后，盖土5分至1寸，由于等高开行，犁沟泥向外翻，播种盖土后，仍有一埂，則于承接春雨，加上有机肥料，能保持水分和养分，幼苗生长极为迅速、健壮。

播种15天左右，再到畜地检查，凡有缺苗，可将邻近穴較多的苗移植，不伤根叶，成活率很高，故极少缺苗，第一次中耕前一次完成間苗及早間苗，可以减少土壤中的肥料消耗，且在幼苗細小时，根群入土不深，間苗时，不影响苗株的生长。然后分期追肥，注意保肥就可以达到高产了。

积肥运动也在合作化以后大大推行了。这里在农业生产上，很早就用草木灰和人粪及牲畜粪，犁田用牛耕，但一般是放一次或两次肥料，解放后放肥的次数增加到四次，肥料的种类也增多了，如颗粒肥料，細菌肥料，土化肥，綠肥桐麸等。过去，农民們不注意积肥，积肥运动开展后，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掀起积肥的高潮。东里屯在15天內就积得岩泥15万斤，他們大都利用早晚休閒時間搞积肥，沒有一个就誤生产。末旺屯的貧农陈永运、陆美兰（女）扳拉屯的貧农韦建設、李廷开都在天还未亮前，就已經各挑三担肥了，得到了积肥能手的称号。老紅軍陈保根在1956年撿得粪肥300担，1957年撿得420担，是全屯撿粪的模范。

放肥的数量也一年比一年的增多了，1958年晚稻每亩就放細菌肥料200斤，中稻每亩放颗粒肥料360斤。

党领导群众进行了防治病虫害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过去这里的虫灾是很多的，几乎年年都有，1937年的虫灾尤其利害，全屯的稻田都长了虫，每天上午，农民拿手耙去梳虫，一个人一个半天就梳得十多斤，到午后虫下根去了。这年的庄稼只收得40%，歉收半数以上。解放后，經過宣传教育，群众們認清了防治的重要。1956年，东里屯发生大苞虫

灾害，不但本屯的群众积极捕捉，还組織邻屯如那峨、那立两屯 100 多群众帮助捕捉，这年暑假回家的中学生，也都投入了这一工作。兽害要算猴子和野猪了。未旺屯在1946年就被野猪吃掉玉米20亩，稻田10亩，全屯除掉地主韦也逃合不缺粮，全屯都缺粮。这些灾害到解放后全少见了，即有发现也由民兵組織去打。同时，历年来，一經发现有虫时就噴射六六六藥粉。东里屯的虫害已基本消灭了。

組織起来力量大，这在高級社成立后格外明显，那时劳动力有 380 人，到1958年大跃进以后，組織軍事化，那烈乡为一个营，689 个劳动力，东里屯是該营三个連之一，連与連之間且开展了劳动竞赛。在中稻追肥竞赛中，那烈乡全营有14个生产队，八个生产队获得了奖状，其中东里屯就占有四队，还有在开荒种猫豆的竞赛中，东里屯开荒了 180 亩，收获猫豆 19,000 斤，当年秋天这个屯又获得了奖状。

东里屯的农业生产各个方面都呈现在欣欣向荣的气氛中。

(三)

正由于党和政府在农业生产上采取了上述許多措施和一系列的工作，因而使东里屯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在1957年的积肥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1958年，东里屯群众在种植早晚玉米时，采取技术規格。单行、单株、密植。原来放肥三次現在多加一次。1958年的中稻，因为1957年干旱，秧不能播，再种又超过季节，所以不能全部栽种，只按技术規格 4×8 ， 3×7 种300亩，其余102多亩，內有50亩是五連插条种，因为种植太密，影响收成。后又改种晚玉米和紅薯15亩，其他40多亩种晚稻种子，收成只有50%。这一年玉米扩大种150亩，所以1958年的玉米收成比1957年或其他年多。往年玉米收成是 25,000 斤；1958年的早晚玉米是 4 万斤，增加几乎一倍半。1958年虽然天旱，东里屯的中稻是按合理密植的規格种植的，亩产收成大大增加。1958年，整个那烈大队卖出公粮15万斤，东里屯就有68,000 斤，占总数一半以上。

东里屯的群众曾經经历过艰苦的革命斗争，解放后，又在党的教育下，积累了战胜自然灾害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丰富經驗，人們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特别是以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的开展，使得稻谷和玉米的产量迅速提高。

从单位面积产量來說，解放前1949年——解放后1958年，东里屯的稻谷和玉米产量的增长，可以由下面一些統計数字來說明：

年份	稻谷(亩产以斤計)			玉 米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1949	400	380	300	175	150	100
1953	400	390	360	215	175	140
1956	530	429	380	325	270	200
1957	530	430	380	350	275	200
1958	700	500	450	600	400	250

再从稻谷和玉米的增产指数来看，也是逐渐增长的。茲以解放前1949年为100：

年份	稻 谷			玉 米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194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53	100	102	120	123	117	140

1956	103	113	127	185	160	200
1957	103	113	127	200	163	200
1958	184	131	150	342	266	250

可見，单位产量是迅速的增长了。这充分说明了党领导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比任何私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走向幸福的农民生活

东里屯，这个革命老根据地，从1921年就开始进行了革命活动，所以这里的群众觉悟性比较高。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地方进行了三次以上的烧、杀、掳、掠，受到的摧残比较严重，更加以毒辣的压榨政策，和不合理的横征暴敛，使这人多地少而土质瘠薄的山区破了产，一直在走下坡路，过着每年缺少半年粮的饥寒交迫的生活。

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已逐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使长期落后的状况得以迅速改变，面貌全新。

从解放前的负担和解放后的负担来看，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在这个对比中，东里屯的各族人民深刻地认识到解放前反动政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同时，也亲切地认识了解放后人民政府的人民性和进步性。

解放前，东里屯农民要负担国民党的田赋税、屠宰税、烟酒牌照税，以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按农民的话来说：“国民党的负担是永远也交不清，永远也交不完”。与上述情形完全相反，解放后农民除了每年缴纳一次公粮，根本没有任何负担，而且在东里屯还有部分田地受到减免公粮的优待。

解放前在无官不贪，无事不捞的情况下，一切税收都成了反动政府伪官员向农民敲诈勒索的机会；都成了他们发横财的門径；与上述情形完全相反，解放后，人民政府则采取了发动群众民主评议的征收方法来征收。几千年来与横征暴敛并行的敲诈勒索，也被翻了身的农民埋进坟墓去了。

解放前的反动政权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是用人民的血汗来供养人民血汗的榨取者；用人民的血汗来维持和巩固地主阶级庞大的国家机构，然后再经过它来加强对人民的榨取，加强对人民的反动统治。因此，这是为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服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国民党反动政权对人民的剥削压榨，必然是“竭泽而渔”了。与此完全相反，解放后，人民政府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这里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人民缴了公粮，使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权更加巩固和加强起来，这样，就可使人民的利益得到根本的保证。两种不同性质的政策，便产生了两种根本相反的结果。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的苛捐杂税，使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各项设施，不但发展了农业生产，且大大提高了农民生活的水平。从这次调查的100户，544人，（其中贫农94户，509人；中农6户，35人）的农民生活所提供的材料中如农作物（包括稻谷、玉米及杂粮在内）的收入，就显示出一个鲜明的对比。

解放前，1948年的农作物，每人平均收入折谷为266斤；解放后1953年为313斤，1956年为409斤；1958年为549斤。以解放前1948年为100，那末，1953年土改后的农作物收入，就1948年增长117.67%；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收入，就比1948年增长153.75%；1958年跃进后的收入，就比1948年增长206.38%。

在农村副业收入方面，解放前仅41,746斤，增加到1953年的86,669斤，1956年的94,261斤；1958年107,927斤。副业所包括的是养猪，种植桐果和茶果，主要的是桐果。养猪的收入并不大。这里的副业还不发达，党已拟定了在这方面发展的规划，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也要大力的搞副业生产。

再从解放前后，东里屯这100户农民生活的收支情况来看，更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给饱受煎熬的贫苦劳动人民生活逐步走上幸福的道路。

他们的收支情况是这样的：——

年 代 收 支 情 况		解 放 前	解 放 后		
		1 9 4 8 年	1 9 5 3 年	1 9 5 6 年	1 9 5 8 年
收 入	农 作 物	144,710斤	170,197	222,299	298,448
	副业及其他	56,895	84,529	94,705	107,927
	合 计	201,605	259,726	317,004	406,375
支 出	生 产 资 料	178,019	58,915	31,892	32,304
	生 活 费 用	182,575	244,992	275,957	305,684
	合 计	360,594	303,907	307,849	237,998
剩 余 额		-158,989	-44,181	9,155	68,377
地 租 额		8,040			
公 粮 额			8,509	1,115	

註：单位：以谷计算（按斤）

解放前1948年谷价每斤0.8角（伪币）

解放后1953年谷价每斤0.43角

1956年谷价每斤0.47角

1958年谷价每斤0.55角

从上表看出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在东里屯所实施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所采取的许多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都已开花结实。

在收入方面，1953年比1948年201,605斤增加12.88%；1956年比1948年增加15.72%，1958年又比1948年增加20.15%。值得指出的是，在支出中，更可以看出生活得到大大地改善，如生活费用的支出1953年就比1948年增加13.41%，1956年比1948年增加15.05%，1958年又比1948年增加16.73%。更非常醒目地显示出：解放前1948年的收入中，只偿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费用的支出，不但没有剩余，而且不足158,989斤。但是，还要缴纳国民党反动政府田赋8,040斤，由此可见解放前东里屯农业生产力的薄弱和农民负担的沉重及生活的贫困了；与此相反的，解放后，1953年虽然仍缺粮44,181斤，但比1948年却减少14,808斤，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这里不但不缺粮了，而且剩余9,155斤，虽然缴完公粮11,115斤，不足1,960斤，也都得到救济。再从粮食统购统销来看，1955年前，东里屯每年至少要统销3万多斤，1955年以后，统销的数字就降到2万多斤。1958年大跃进以后便降到2千多斤了。这还不算，国家向那烈大队征购1万多斤，东里屯就卖给国家余粮6万8千斤。

在这100户的人家中，有烈属10户，48人，更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在1952年11月间，一次就受到救济大米1,097斤。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农业生产得到大大地发展，使他们的收入增加，生活得到了改善，人民公社体制下放后，对增加烈属收入，改善生活更起了重要作用，再加上原有的粮食供给制，烈属的生活问题得到更可靠的保证，从工资

收入水平来看，除1戶因劳动力少，人口多，其他9戶烈屬都已有90%达到和超过一般社員工資收入水平。对这一戶人多劳动力少的，經大队研究采取优待工資的办法，給予优待。具体的办法，全大队每月发放工資总额，由全大队总人口来平均，这个平均数就作为一般社員工資收入水平，如这戶烈屬全家所得的工資平均每人达不到总平均数，其不足部分，由大队負責补助，保証他們生活水平不低于一般社員，补助次数与工資发放次数相同。对烈屬中，遇有临时困难如劳动生病或小孩生病而需要专人照顾而誤工或无法开支医疗費的，由大队研究酌情給予临时补助。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也因而有显著的提高。这表现在农民购买的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上。从生产資料上来看，解放前1948年这里只有农具401件，耕牛106头，猪155头，解放后由1953年的农具458件增加到1958年的521件，其中还有新式五三步犁，八齿耙等。耕牛由1953年增加到1958年的171头；猪也由1953年175头增加到1958年的180头。

从生活資料来看，解放前1948年全屯只有瓦房29間，衣服587套，蚊帳157张，棉被125床；解放后由1953年瓦房修建了68¹/₂間，到1956年的69間，1958年的89間，現全屯³/₅以上是瓦房。衣服由1953年825套增加到1956年的1,074套，1958年的1,230套；蚊帳由1953年197张，增加到1956年的337张，1958年的474张；棉被也由1953年185床，增加到1956年的337床，1958年的446床。識字的人都已有了鋼笔和筆記本，在1958年已有胶鞋33双，手电8个，青壯年人大都穿棉綫背心，青年妇女穿花衣服的也不在少数。除此之外，屯里面現在已有了电影放映队，正在准备放映。

这些事实摆在东里屯农民們的面前，使他們体验到党和人民政府处处在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处处在为人们美好的生活盘算，他們已經看清楚了他們的幸福前途！更加坚强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奋斗！

叁、政治面貌

一、解放前的政治斗争情况

从辛亥革命以后，到1924年前，整个东里劳动人民的命运都为当时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操纵。当时的县、乡、保、甲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劳动人民的行政机构。县、乡、村、甲长是统治阶级的得力工具。“团统”是掌握武装去镇压人民的狗腿子，他下面的征兵经常到各保、甲去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以烧、杀、掳掠农民群众为业，弄得穷人“有苦没处诉，有仇没处报，有理无钱要坐牢”，东里的500多个群众，也嚐够了这些苦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在这九死一生的环境里，谁也不能忍受。勤劳勇敢的东里人民，他们要生存，要生活，他们就得坚决反抗这种黑暗制度，想寻求光明的道路。这时候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僮族韦拔群同志就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军阀”等口号。使多年受苦受难的群众找到了出路纷纷投入革命队伍，因此革命势力一天一天的壮大起来了，接着便向韦龙甫、杜七、杜八等土豪劣绅清算，打垮他们的威风。1924年冬韦拔群同志去广州参加毛主席举办的农所学习。回来后便在列宁岩举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

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要恢复他的统治地位，便想尽一切办法来对抗革命，集中所有的反动势力到革命根据地——中和各乡镇压革命。1925年12月先派伪团长龔寿仪率队到东兰中和，西山等地大肆地烧、杀、掳掠，各区乡农民协会和第一届农所均遭到破坏。当时革命武装只转入西山进行活动，组织暗杀团和敌人坚持斗争。直到1926年龔匪调回百色，革命又恢复正常活动。

1931年2月广西李、白军阀又派伪师长廖磊部队来配合地方民团共数万人向东兰、凤山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敌军在苏区到处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那时候大部份苏区淪于敌人之手。革命政权又遭到第二次破坏，革命群众受尽了匪兵的摧残，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东里的共耕社也在这时候被破坏而解散了。敌人严密地封锁着革命根据地——西山一带，并且经常围寨搜山。

在这紧张的关头里，韦拔群同志亲自领导革命武装四处游击坚决与敌军作你死我活地斗争。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我军打仗百战百胜。1929年10月韦拔群同志亲自带领一班人在中和区巴学乡和匪军司令陈子怀，韦鼎伯匪帮打了一仗，敌军有1,000多人，又是新武器。由于我军战士个个革命意志坚强，他们只有一条心——一定要打败敌人，不打败敌人绝不罢休。敌人虽然兵多，武器好，也没有用，一打起来，就好像一群野兽一样，没组织没纪律地乱跑。子弹打了很多，结果作用不大，我军虽子弹少，但百发百中。所以这次战役胜利还是属于我们，三个敌兵还在战场上被我们抓倒。我军只牺牲一人。

在斗争中，韦拔群同志常常利用各种妙计来击败愚蠢的匪兵。

(一)土地雷

一九二八年五月間，匪兵又要來搜山，韋拔群同志布置第二中隊二十多人到西山五錢鄉山坳去阻擊敵人，並在路口埋下兩個土地雷，一個鐘頭過去了，土地雷也裝好了。一幫匪兵真的大搖大擺從弄京崗向五錢鄉走來。第一個走近了地雷，沒碰到平安無事地跨過去了，第二個也還沒踩著，還是讓他逍遙自在地哼著什麼小調地過去了。第三個又來，這回真的不客氣了，腳下紅光一閃“轰”的一聲巨響，冒起一股濃煙，這幾個匪兵馬上倒下去了，後面的那一堆匪兵，有的向前跑，有的往後逃，就在這時候，我軍中隊長大喊“打”，一陣槍聲，又倒了幾個匪兵，中隊長又喊“沖呀”“同志們”，大家就象猛虎抓羊一樣地直追這群匪兵到弄京屯後背山，全部消滅了這批傢伙。繳得不少槍枝子彈。從此，西山區便到處利用“土地雷”來擊敗敵人，匪兵得嚐了這次味道再也不敢到處橫沖直闖了。

（二）假子彈箱

也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偽營長黃明遠在東蘭找不到韋拔群同志，便氣沖沖地拉隊往鳳山跑與匪營長羅松康匯合加上鳳山地方民團共數千多集中在加里鄉。韋拔群同志得到這個消息馬上集中東蘭縣一部分赤衛隊約600多人（只有300多枝槍，其他都是大刀之類），一枝槍頂多也是配備15、16發子彈，所以有部分戰士怕子彈少，打不過敵人，就產生斗志不高，剛出發到鳳山縣加里鄉就與匪兵打起來。起初還是我們占領了高地，因為子彈少，不敢向敵人猛攻，結果倒反被敵人向駐在加里的赤衛隊進攻。韋拔群同志見情況不妙。心想，敵人兵力多，我方攻不下的主要原因是戰士斗志不高，顧慮子彈少。因此，他就在一天晚上親自帶領一個班連夜回到中和，一到中和就暗地找木板來制成廿五六個子彈箱，箱內放滿石磚，約等于子彈的重量，箱內寫著“七九”“六八”的字，並封好後，就找十多二十個群眾把這些“子彈箱”送往鳳山加里鄉去。一路上到處吹號，企圖想使沿路群眾知道子彈已送到了。到加里附近的一個村子，便放下子彈箱，大吹洋號，並下通知給駐各村屯的赤衛隊來領子彈。韋拔群同志還交代：“這些子彈不能隨便用。等上戰場才送去支援，現在不能開……”。赤衛隊知道了，非常高兴，大大地鼓舞戰士們的斗志。敵人知道了非常慌張，韋拔群就馬上抓住這個時機向赤衛隊發出沖鋒號，戰士們都向敵人沖去。黃明遠匪幫只得紛紛潰退。我軍一直猛追匪兵三天三夜，把黃明遠、羅松康匪幫趕到鳳山城才停止。取得了這次戰爭的全部勝利。

一九三二年九月國民黨當局又向革命根據地——西山第二次圍剿，在萬惡的反動頭子白崇禧親自指揮下的廖 磊軍共一萬餘人，採取层层包圍的手段，並且執行“四光”（燒、殺、擄、剷禾苗光）。當時西山境內到處皆偽兵，敵人還利用搬村的方法，把最革命的村屯群眾移到另一個村集中住以便利他們的“防守”。這一次革命受到很大的損失。各級蘇維埃政權都受到摧毀。東蘭的最後一支革命武裝——殺奸團和黨在“三山”的支部組織全被破壞。（三山是指西山、東山、中山），絕大部分同志犧牲了。韋拔群同志也在这次被叛徒市昂殺害，剩下來的幾個同志（如黃舉平等）只得轉移外地繼續革命活動。

東蘭的革命群眾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又重新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和剝削了。

二、解放後各大運動的發展情況

東里是右江革命的起點，是韋拔群烈士故居。1922年在韋拔群同志的領導下，曾在这美麗的地方轰轰烈烈的鬧起革命，成千上萬的革命隊伍開始在这里出發去打土豪、打軍閥、打

倒国民党反动派。

大革命失败后，韦拔群同志光荣地为革命牺牲。勤劳勇敢的东里人民曾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的摧残、剥削，敌人多次地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掳掠“三光”政策。使热爱劳动，热爱革命事业的东里的劳动人民简直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推翻了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统治，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翻了身，当上了国家的主人，摆脱了贫困，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从此以后富有革命传统的东里人民便积极地起来建设自己的家乡，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历经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下面是各个运动的发展情况：

一、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减租退押

A. 清匪反霸和镇反工作

(一) 清匪反霸前敌人的活动情况

解放初期，那烈乡东里屯的匪霸还是不甘心死亡，耍出各种各样阴谋手段来抗拒人民政府，板拉屯恶霸地主黄世光解放初期伪装积极，混入革命队伍，（参加东兰县秋征工作队）企图想逃避人民斗争，黄世朋（是世光胞兄）破坏水利，扳别屯恶霸陈干，解放后（1950年）窝藏巴马县那吉乡匪霸陈相才等人，（还有2枝步枪）在他家住了半个多月。还组织反共同盟，企图破坏人民民主专政，近解放时陈干还亲自到巴马县那吉乡去联络大匪首陈廷相带兵攻打我革命游击队。解放初，陈干耍两面刀的手法，一方面伪装开明参加革命工作，一方面勾结陈廷相来打革命力量。这说明当时东里的土匪恶霸是相当猖狂的。

(二) 当时群众的思想动态和做法

运动一开始，绝大部分群众（特别是翻身的贫雇农）对敌是有了一定的仇恨，在运动中起到良好作用。也有少部分群众还不敢起来向敌人作斗争。甚至有个别人还怕象民国十八年一样，（民18年革命只胜利一段时间后来又失败了）所以不积极投入运动，袖手旁观，有的还摇摆不定。

为了使运动顺利地开展起来，彻底肃清土匪恶霸及一切反革命份子。首先要解决群众存在的思想顾虑。解决的办法是：

1. 反复地向群众宣传清匪反霸，镇反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目的，指出如果匪霸不肃清对我们的害处。揭露敌人的罪恶行为。使每个群众真正地认识到清匪反霸是人人有责，积极投入运动来。并说明方针政策，使人人懂得政策。

2. 依靠群众，特别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发动群众起来检举敌人的罪恶。孤立敌人，扩大我们的队伍。

3. 分别召开不同会议，做到层层发动，处处宣传，如召开贫雇农、积极分子、老红军会，通过回忆对比诉苦来启发群众仇恨阶级敌人。

经过做了这些工作之后，群众的顾虑基本上已消除了，政治觉悟比以前提高了。由于群众政治觉悟提高，于1951年把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恶霸黄世光逮捕法办。接着也先后逮捕地主恶霸黄世朋，陈干等人。安定了社会秩序。从此以后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更加相信了。

B. 减租退押

清匪反霸取得全胜之后，各级人民政府都建立或健全起来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更加提

高，他們不但在政治上要求解放，而且很迫切要求在經濟上得到彻底解放，党便根据群众的要求和为适应新解放区农民目前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于1950年冬至1951年初在各地进行减租退押运动，那烈乡东里屯的貧僱农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向剝削者——地主富农清算剝削賬了。运动的过程是：

1.認真地依靠貧僱农，团結中农向地主富农減租退押。

2.向广大群众宣传減租退押的方針政策及其重要意义，使群众对运动有了正确的看法，积极地投入运动来。

3.发动苦主，依靠苦主去串連群众，依靠苦主去帶动群众起来向剝削階級清算剝削賬。

东里屯減租退押对象是黃世光、黃世朋、陈有举、陈有祥等戶。这帮傢伙在解放前霸占田地，剝削长短工很厉害。由于发动群众得好以及有了解放軍紧密地配合，苦主韦秉琚、陈家倫、陈家伍等都积极地起来向剝削者清算，其他不是苦主的也紛紛起来投入斗争行列中去。在群众的压力下，剝削階級黃世朋，陈有举等不得不低头認罪，共退出剝削債10,000斤谷子。（光是东里片的数字）这是有史以来被剝削者与剝削者第一次斗争的胜利。

二、土地改革

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东里的人民把残余的匪霸消灭。得还了过去被剝削的血汗錢，在这基础上，还迫切要求得到足够的土地耕种，改善生活。党又为了满足劳动人民的要求，决定在未經过土地改革的地区进行土改，那烈乡也与其他地区一样，于1952年冬至1953年初进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具体做法是：

土改队进村后，首先依靠原有的基层組織（乡农会）先向乡干部說明土改的重大意义，然后由乡干部介紹該乡各村屯的一般情况，接着找出最穷最苦的人准备培养为土改根子，东里屯决定韦日好、黃应伍、陈家祥等人（僱农）为根子，土改队馬上分別下到根子家去打“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先从生产入手进行訪貧問苦，說明土改的方針政策，土改意义，土改对誰有利……在这基础上帮助引导苦主訴苦，通过算細賬（算生活賬和剝削賬）使他們仇恨敌人。分別召开不同类型的會議，如貧僱农会，积极分子会，老紅軍会大力地宣传土改的方針政策，号召他們起来积极地投入运动，坚决地向剝削階級——地主富农作无情地斗争。会后又采取个别发动，个别串連的办法来扩大我們的队伍。接着便找斗争对象（划階級）并說明划階級的界綫。当群众懂得划分階級的界綫后，苦主便紛紛提供材料加上土改队深入調查了解，东里屯便先后划黃世朋，黃世光，陈有举，陈有祥，韦也述合为地主，陈恩长为富农，便向广大群众宣布地富名单，决定准备开展斗争。

群众一知道斗争对象以后，个个都很高兴，大家都轰轰烈烈的起来向他們斗争，算剝削賬，从此我們的力量便一天天庞大起来了。90%以上的貧僱农和中农变成我們的力量。这时候运动便轉入斗争階段。先塞封地主的房子，并布置一定的力量控制他們的活動，开展斗争，算賬叫他們交出余粮来。（每戶交多少余粮由群众决定）一方面斗争，一方面号召群众报上当，講清报上当的政策。（即自报有功，代藏无罪，誰报誰得，坚决不报就是地主的保家队……）。

正当斗争很激烈的时候，不甘心死亡的地主階級又要出許多不法的手段来抗拒土改，抗拒人民的斗争，如分散财产，收买干部，收买貧僱农，假裝投降，伪裝开明等，特别是分散财产很严重。板別屯地主陈有举把棉被，布匹拿到山上藏起来，又将一部分衣服、洋紗分散到那論乡韦文丰家收藏起来（韦是他的外家）。板拉屯地主恶霸黃世朋老婆还将金戒指，耳